

读史札记

佛教与政治之间：土尔扈特汗 “精进修行”汉字官印考

巴·巴图巴雅尔

17世纪二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率部众西迁至额济勒河（伏尔加河）流域，建立土尔扈特汗国。土尔扈特汗国汗、诺颜、贵族及大臣处理汗国内外军政事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均需钤盖印章以为凭证。从现收藏于各国档案馆的档案来看，土尔扈特汗国历任汗、诺颜曾使用多种印章。这些印章形状各异，使用文字各不相同。2004、2009年，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学者先后整理出版《卡尔梅克汗国汗鄂尔齐渥巴锡信函集（18世纪）》^①、《18世纪卡尔梅克诸汗及同时代人书信集（1713—1771）》（选编）^②两部托忒文档案汇编。上述档案汇编共收录托忒文信函206件，均为原件影印出版，每件信函上钤盖有鲜明的不同文字、形状各异的官印，它们生动反映了汗国政治与社会的状况。这些官印在中国政治史和官印制度史上都非常少见，对其考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土尔扈特汗汗国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了解。这些官印尚未进入研究者视野，因而值得认真收集研究。在这些官印中，有一枚方形印最为特别，印文为汉文篆字“精进修行”。本文拟就这枚汉字印章的来龙去脉及其政治文化的意义，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汉文篆字“精进修行”印及其使用情况

目前，我们只能在档案上见到这枚印章的印文，尚未找到实物。因此，我们对该印章的材质、高度、纽形、款识等，一无所知，只能确定：该印章为方形，印文系汉文篆字，印面尺寸为4.5×4.5cm。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托忒文档案情况来看，这枚汉字印章使用于1710年至1775年10月，即当清朝康熙四十九年到乾隆四十年之间，钤盖此印章的托忒文档案共74件。

康熙四十九年，土尔扈特汗国阿玉奇汗长子沙克都尔扎布致俄国阿斯塔拉罕省军政长官的三封托忒文信函上钤盖有此印章，信函内容涉及军事、外交等，这是迄今已知最早使用此印章的公文。其后，阿玉奇汗孙子、沙克都尔扎布儿子敦罗布喇什汗（1741—1761年在位）在1737—1763年间致俄国阿斯塔拉罕省军政长官的19件托忒文信函中，均钤盖有此印章，信函内容涉及

[收稿日期] 2016-06-16

[作者简介] 巴·巴图巴雅尔(1972-)，男，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乌鲁木齐830017；batubayar99@163.com

[基金项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研究中心招标课题—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2013年度招投标课题重点项目“托忒文档案中的渥巴锡”（批准号：XJEDU040213B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卫拉特蒙古档案调查与研究”（批准号：15BZS1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Гедеева Д. Б. Письма наместника калмыцкого ханства Убаши (XVIII в.). Элиста, 2004 г.

② Сусеева Д. А. Письма калмыцких ханов XVIII ве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1713—1771 гг.), Избранное, Элиста, 2009 г.

军事、经济、法律、外交、宗教、派遣使者、汗国内政、游牧等。1761年1月21日，敦罗布喇什汗去世，其幼子渥巴锡承袭汗位，成为土尔扈特汗国汗鄂尔齐。^①渥巴锡在1763—1771年间致俄国阿斯塔拉罕省军政长官的托忒文信函有40件，均钤有此印，内容涉及派兵打仗、经济贸易、法律纠纷、赋税、卡伦戍边、宗教、派遣使者、汗国内部政务、游牧草场、户口、盐务等方面。以上档案均收藏于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国立民族档案馆。

此外，1710—1711年间，在沙克都尔扎布和他的儿子达桑致俄国军政长官的托忒文信函中，有4件也钤有这枚印章。这4封信函现藏于圣彼得堡大学图书馆卡尔梅克文献库。

1771年，土尔扈特汗国汗鄂尔齐渥巴锡率部东归后，在1771—1775年间给清朝乾隆皇帝、伊犁将军、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的托忒文信函上也钤盖了此印章。目前已知的这类信函有9件，信函内容涉及归顺清朝的原因，奏报部众生计情况以及耕田农务、救济谢恩等。这些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另外，甘肃省拉卜楞寺大经堂亦收藏有1封钤盖此印章的托忒文信函，内容为渥巴锡部被安置于喀喇沙尔以后，从拉卜楞寺延请喇嘛和额木齐（emči，大夫）的信件。

从这枚印章的使用情况看，此枚印章的主要使用者或所有人是土尔扈特汗国的汗或汗鄂尔齐等重要人物。其主要用于处理土尔扈特汗国内外军政事务及经济贸易等事项，因而它起着官印的作用，甚至可以视作汗国的国玺。这种情况令人颇感困惑。因为从印文内容看，这枚印章应属佛教出家人的个人印章，但究竟是一位喇嘛之物，还是汉僧所属，有待考证。考虑到卫拉特蒙古人崇信藏传佛教，该枚印章最初应系一位喇嘛所有，后来不知何故被土尔扈特汗国的当权者用作了汗国处理内外事务的印信，为它赋予了政治的功能。其作为一个实物象征，在中亚史和中国史上的丰富涵义有待阐明。

二、“精进修行”印章的来历

从印文看，此印章无疑是一枚佛教出家人的印信，而且是汉字印章。那么，它是如何成为土尔扈特汗国领袖处理世俗军政事务上的官印呢？

1710—1775年间，中原地区已经是清朝的天下。由此看印章有可能是清朝颁给土尔扈特汗国某个喇嘛的（后因某种原因阴差阳错地成了汗国的官印），可是该印印文并不符合清朝的官印制度。因为，清朝官印一定同时镌刻有“国语”——清文（manju gisun），而该印印文，只有四个汉字“精进修行”。因此，其为明朝政府赐给土尔扈特部高僧物这一可能性最大。

卫拉特与明朝建立政治、军事联盟的同时，达到了和中原内地沟通市场、交流文化的目的。卫拉特贵族为了稳定统治，满足需求，对内地的贸易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明廷为了羁縻和控驭卫拉特，也部分满足了卫拉特的需求。于是，在卫拉特和明朝之间呈现出了和好、贸易的景象。

自明永乐以后的明蒙战争中，卫拉特几乎一直是明朝的盟友。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元年至五年（1403—1407），马哈木等与鬼力赤连年战争。永乐六年（1408），阿鲁台另立本雅失里为可汗，翌年，率兵出击卫拉特，被马哈木等击败，退走克鲁伦河。马哈木等经此战役控制了鬼力赤的故土甘肃边外之地。但是阿鲁台自恃力强，不仅与卫拉特抗衡，同时也与明朝为敌。于是，明朝开始扶持卫拉特。永乐七年，明朝封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人为王。其中土尔扈特

① 鄂尔齐：卫拉特蒙古语，土尔扈特汗国一般将应继承汗位的人先确定为鄂尔齐。鄂尔齐（oroči）一词在《土尔扈特诸汗史》和渥巴锡于1771年呈清朝的信件中均有出现。oroči（鄂尔齐），词根为oron，意为“位置”、“席位”、“候补”、“预备”等含义，-či为名词附加成分。鄂尔齐（oroci）是“汗储”、“太子”、“储君”的意思。该词在俄语中译作наместник（代理人），汉译时却译为“总督”、“督办”、“副汗”、“部长”等。而后，根据汉译又蒙译成“总指挥”、“全权大臣”。这些译名与原意相差甚远了。

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①永乐元年以后，明廷几次派人赍敕往谕卫拉特马哈木等领袖，双方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到托欢、也先时代，卫拉特与明朝的来往更加频繁，明廷曾授卫拉特400多人以官爵、封号。

卫拉特蒙古与明朝之间的这种政治经济关系，也推动和加强了双方在宗教方面的联系。也先时期，瓦剌佛教非常兴旺，双方宗教往来非常密切。如《明英宗实录》正统二年（1437）十二月九日条云：

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答兰帖木儿等为指挥、千户、镇抚等官。初，哈马刺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刺失力僧衣一袭，及答兰帖木儿等冠带。^②

《明英宗实录》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十二日条载：

瓦剌太师也先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刺麻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襴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③

《明英宗实录》景泰三年（1452）十一月三日条载：

（瓦剌太师）也先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里、番僧撒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④

根据清朝档案，渥巴锡曾经向清朝上缴一枚印章，系象牙镶银，印侧镌汉字二行：“永乐二十二年三月三日，赐喇嘛密札室哩”。^⑤这是明朝封土尔扈特部首领太平为贤义王15年之后的事。由此看来，“精进修行”这类印文的印章，也应是明朝颁发给该部落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

此外，明朝对边疆地区实行封授官职、同时颁给喇嘛印信的制度，使西藏和其他各地方首领和佛教各派领袖直接受命于朝廷，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在西藏先后封有大乘法王、阐教王等法王、教王，所封禅师、喇嘛、都纲、僧纲等则更多，已知保存至今的印文为汉字的印章有如下四枚^⑥：

印 文	规格、款识
净修觉道	象牙印，佛轮纽，高6.5厘米，方，边长4.3厘米，款识：右上“赐副都纲禄竹聪密”、左上“正统十三年月日”，现藏于布达拉宫
妙缘清净	象牙印，佛光纽，高7.1厘米，方，边长4.3厘米，款识：右上“永乐十四年三月日”、左上“赐也失藏卜”，现藏于布达拉宫
圆修般若	明代，象牙印，佛光纽，高6.4厘米，方，边长4.3厘米，款识：右上“宣德二年月日”、左上“赐喇嘛栗哩结藏卜”，现藏于罗布林卡
如如自在	象牙印，佛光纽，高6.7厘米，方，边长4.3厘米，款识：右上“赐喇嘛舍罗藏卜”、左上“正统二年九月日”，现藏于罗布林卡

从印文字体、内容两方面看，“精进修行”与上述几枚印章基本相同，应属于同一性质。

三、“精进修行”印章的结局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这枚喇嘛的个人印章成了土尔扈特汗国领袖的官印，就我们目前掌握的

① 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② 《明英宗实录》卷37，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0712、第0713页。
③ 《明英宗实录》卷137，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2722页。
④ 《明英宗实录》卷223，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第4819、4820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50页。
⑥ 《西藏历代藏印》，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42、45页。

材料而言，尚无法考证。

1771年，土尔扈特汗国汗鄂尔齐渥巴锡率部回归故土，归顺清朝。同年9月，他前往承德，觐见乾隆皇帝，被册封为汗，并赐汗号。1775年1月9日，即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渥巴锡汗病故，其子车凌那木扎勒袭位。是年10月，清朝在土尔扈特部实行盟旗制，并按清制颁发官印，以便行政。清廷颁发给土尔扈特部南路的官印有：“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之印”、“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南部盟长之印”、“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南旗管旗扎萨克之印”。^①

根据我们掌握的档案资料，在清朝颁发汗印、盟长印、扎萨克印之前，渥巴锡和车凌那木扎勒一直使用这枚“精进修行”印章处理本部政务。而在此之后，也就是说，在1775年10月之后，这枚“精进修行”印章便不再使用，而经皇上例外恩准，其作为祖传之物珍藏于该卓里克图汗及其后人手里。关于这件事的相关满文档案有三件，标题分别为：

(1)《喀喇沙尔办事大臣达色奏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启用新印未收回其旧印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初一日)；

(2)《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查询观音保是否已晓谕土尔扈特汗停收旧印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初二日)；

(3)《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侍卫观音保未收到土尔扈特汗所用旧印不必收交谕旨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②

第一件最能说明土尔扈特东归后这枚印章的使用情况和结局，谨汉译如下：

奴才达色谨奏：为奏闻奉旨事。

是年九月二十日，接军机大臣字寄，乾隆四十年八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授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为盟长，颁给扎萨克印信，其原有“精进修行(jing jin siu hing sere hergen i temgetu)”印信，不可续用之处，曾谕观音保晓谕，将其(印信)收回京师。

今窃思，将其业已授为盟长，依印制，应行用印，其旧有印信，已成无用之物。倘从其手中收回，恐生猜忌，此乃并非一定收回送来之物。将此事寄信，晓于观音保。倘策璘纳木扎勒已将其印信，交与观音保，仍依前降之谕，顺便解送京师。倘未及就此晓谕，则不必言于策璘纳木扎勒，将此无用之物，令其自行处理。……查得，土尔扈特汗策璘纳木扎勒，有小印信一枚。收回策璘纳木扎勒此印信之事，奴才未曾提及。驻守土尔扈特游牧侍卫观音保，于其接奉上谕之前，曾告知奴才，伊等未向策璘纳木扎勒提及收回印信之事。等语。奴才等，谨遵上谕：使此事等同于无，令其自行处理。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十月初。

按照清朝印制，颁授新印，一定要缴回旧印，并加以销毁。这次皇帝体察具体情形，颁土尔扈特汗清朝印章之后，允准该部首领保留这枚祖传印章，以作纪念。这种做法虽有违清廷规制，然而不失为一种抚绥之举，有利于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此后，这枚“精进修行”印章的命运如何，现存何处，我们均不得而知。

^① 道尔基、巴·巴图巴雅尔、李杰著：《清代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印章研究》(蒙汉合璧)，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卷12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5、121、186页。